



遗产如何制造未来?

——罗德尼·哈里森《遗产未来:自然与文化遗产实践的比较路径》导读

●王林洁

摘要:罗德尼·哈里森主编的《遗产未来:自然与文化遗产实践的比较路径》,是遗产研究“未来转向”的代表性成果。该书打破传统遗产研究以过去为中心的范式,将“未来”从隐含前提转化为核心分析对象,提出遗产是通过当下实践主动参与未来生成的“社会—物质”机制。全书围绕“多样性”“过剩”“不确定性与转变”四大主题,以跨领域比较、民族志与视觉方法为路径,系统阐释遗产实践如何制造、塑造乃至冲突性地建构多元未来。其以“未来生成能力”为核心概念,批判静态保护观,倡导面向人类世的开放、反思与协作式遗产伦理,为当代遗产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范式。

关键词:遗产转向;未来生成实践;批判遗产研究;多元遗产;人类世

文章编号:1003-2568(2026)04-0030-08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王林洁,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引言

“遗产未来”^①(Heritage Futures)汇聚了罗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等来自遗产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博物馆学与科学技术研究多个领域的16位研究人员,共同探索不同遗产领域之间开展创新性交流的可能。这次探索不仅是一次集体性的学术行动,而且更是在哈里森个人学术理论的阶段性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其学术历程中,哈里森始终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即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遗产如何在当代世界中不断制造、动员,并嵌入更广泛的政治、伦理与未来想象之中。正如他在《作为社会行动的遗产》^②(*Heritage as*

Social Action, 2010)一文中所阐述的那样,遗产并非静态的历史遗存,而是通过具体实践持续参与社会关系与价值秩序生成的过程。《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③(*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2013)明确提出,遗产是在当下的权力结构、制度安排与社会行动中被不断生产的过程性成果。《超越“自然”与“文化”遗产:迈向人类世的遗产本体论政治》^④(*Beyon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oward an Ontological Politics of Heritage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2015)则对遗产实践的二分框架、遗产治理与知识生产的碎片化现象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其后续将遗产置于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与未来政治语境中加以

①“遗产未来”项目详细信息可参见遗产未来项目的官方网站:www.heritage-futures.org.

②Rodney Harrison, “Heritage as Social Action”, in Susie West (ed.) *Understanding Heritage in Practic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240-276.

③Rodney Harrison, *Heritage: Critical Approaches*, Abing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中文译版:〔澳〕罗德尼·哈里森《文化和自然遗产:批判性思路》,范佳翎、王思渝、莫嘉靖、沈山、张力璠、韩博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④Rodney Harrison, “Beyon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oward an Ontological Politics of Heritage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Heritage & Society*, Vol. 8, No. 1, 2015, pp. 24-4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179/2159032X15Z.00000000036.

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哈里森等人将“未来”这一长期被视为隐含前提但鲜少成为明确分析对象的维度引入遗产研究领域。在遗产研究的“未来转向”中,遗产不再仅被理解为对过去的保存、展示或阐释,而是被重新界定为一种通过当下实践主动参与未来世界生成的社会—物质机制。这一转向并非简单地将研究时间指向从“过去”移至“未来”,而是将遗产研究的核心关切重新问题化。换句话说,未来并不是一个自然到来的时间点,而是在具体的制度安排、技术实践、文化想象与伦理选择中被不断“制造”的复数过程。在未来生成机制中,遗产实践扮演着关键角色。^①

一、核心理念转向:

从“保存过去”到“未来生成”

本书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重新定位了“未来”这一概念。在传统遗产研究中,未来往往作为一种隐含的前提:虽然不在场,但是未来却为保存过去的遗产实践提供了道德正当性,而在本书中,未来不再只是遗产实践的背景条件或前提,而是被明确界定为核心分析对象,成为可以被追问、比较与批判的研究问题。

(一)遗产作为“未来生成实践”

在哈里森及其合作者看来,未来既不是自然到来的时间结果,也不是抽象的理想愿景,而是在当下通过一系列具体实践被持续制造出来的社会—物质过程。其中,政策制定、技术系统、档案机制、分类标准以及不同形式的“保护”实践均在

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未来的建构。哈里森等人将研究焦点从“过去如何被保存”转向“未来如何被制造”,重新界定了遗产研究的时间性结构。与此同时,还进一步提出,未来并非单一的、线性展开的时间图景,而是复数的、分岔的、具有冲突性的“诸多未来”。通过将“未来”这一时间理论引入遗产研究,哈里森等人指出,不同遗产实践正是在当下通过各自的制度逻辑、技术路径与价值假设不断生成着未来。这些未来不仅类型各异、彼此不同,甚至还可能相互冲突:某些实践试图冻结变化,以确保长期稳定;另外的实践则通过允许转变与更新,积极引导未来方向。

未来并非自然生成的,而是被设计和组装的。遗产实践不再聚焦于“是否被保存”,而是转向“何种未来得以可能”的追问。哈里森提出“未来生成能力”^②(futurability)这一关键概念,用以分析特定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能够开启、限制或排除特定类型未来的能力。在扩展的“保护”(conservation)概念——在当下为未来而维护的各种生命、实践、知识、物质与痕迹——的基础上,以及在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的“组装理论”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共同影响下,遗产被理解为由人、物、技术、制度、情感、知识、时间共同构成的社会—技术(生物)政治组装体(social-technical biopolitical assemblage)。也就是说,遗产不再是一个静态的价值对象,而是一系列持续运作的实践过程。此外,组装视角也为将遗产实践还原为多种行动者不断协商、对齐与冲突的过程提供了契机,以此来

^①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and Sharon Macdonald, “For Ever, For Everyone...”,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3-5.

^②Rodney Harrison, “Heritage as Future Making Practices”,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36-37.

强调实践“在做什么”，而非遗产“是什么”。

在更深层的本体论层面，哈里森提出“多元遗产本体论”^①(plural heritage ontologies):不同遗产实践不仅是在保护不同类型的对象，而且更是在通过各自的实践逻辑生产不同的现实世界。在气候变化与人类世的总体情境中，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传统区分日益难以维系。此外，植物、动物、语言、技术系统乃至核废料等长期遗留物均通过不同的保护机制进入社会一时间结构，并在其中生成各自的未来效应。因此，遗产并非单数的本体存在，而应被理解为多种世界建构方式的集合。不同遗产实践所生成的未来世界并不必然相互兼容，反而可能会在资源分配、时间尺度与伦理议程上形成张力。

(二)创新方法论

本书的方法论创新首先体现在对研究对象与研究边界的系统性扩展上。其讨论材料覆盖了一个极为广泛的实践谱系：既包括博物馆及其专业组织、文化遗产与保护地管理机构、濒危语言名录项目，也涵盖冷冻动物园、植物标本馆、种子库、植物园与景观再野化等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研究视野被有意延伸至通常不被视为“遗产领域”的实践空间，如核废料管理与太空信息传递计划。这种跨越“遗产与非遗产”边界的研究设计本身即构成一种方法论立场：通过并置不同形式的保存与留存实践，揭示它们在时间尺度、伦理假设与未来指向上的差异与张力，从而为比较分析奠定基础。

在理解遗产如何“制造未来”上，民族志成为本书的方法论核心。研究团队并未将遗产机构与实践者视为被动对象，而是将其明确界定为“共同研究者”。同时，系统引入并实践了“准民族志”^②(para-ethnography)路径，将研究对象视为具备高度反思与分析能力的知识主体，使其参与问题识别、概念生成与框架讨论等一系列工作。民族志不再只是记录差异的工具，而是成为理解制度实践、技术系统与未来想象如何被共同生产的介入性方法。哈里森等人也对这一协作式路径进行了集中反思，在呈现其进入实践“幕后”的优势的同时，坦率讨论了跨领域合作所带来的概念摩擦与优先序冲突。^③

视觉民族志也是本书的特色，研究团队并未将视觉材料作为附属性的说明材料，而是将照片、影像记录与视觉档案分析视为分析素材，用以追踪物质对象、空间安排与技术操作的可视化形态，特别是用于呈现那些难以通过文字充分捕捉的过程性实践，如样本保存、分类操作与风险管理，这使遗产实践中“看不见的未来工作”得以被感知与分析。

比较研究则为上述方法提供了整合性的分析机制。通过跨学科跨领域的并置，揭示不同实践在时间理解、风险认知与伦理前提下的深层差异，从而促使各领域深刻反思自身的实践。通过民族志、视觉材料分析与比较研究的协同运作，哈里森等人构建了一套面向未来的遗产研究方法论，使将遗产视为一种需要被持续反思和再实践的社会

① Meha Desai,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 2021, 27(12), pp.1345-1346.

② Rodney Harrison, "Beyond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Toward an Ontological Politics of Heritage in the Age of the Anthropocene", *Heritage & Society*, Vol. 8, No. 1, 2015, pp. 24-4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179/2159032X15Z.000000000036>.

③ Rodney Harrison, et. al.,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al.(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465-488.

行动的研究成为可能。

二、实践维度解析:遗产如何建构多元未来

遗产的本质是面向未来的建构性实践,而非单纯的过去遗存。通过“多样性”“过剩”“不确定性与转变”四大议题,全书深入揭示遗产制造多元未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一)多样性:作为分类机制、治理技术与未来建构的实践

在本书中,“多样性”并未被当作一个无需论证的规范性目标,而是被系统性地转化为一个需要被拆解、比较与反思的实践性问题。与其讨论多样性“是否重要”,本书更关心的是多样性如何在当代遗产与保护实践中被制造为重要之物。通过对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与语言多样性的并置分析,哈里森等人指出,多样性并非源自某种自明的价值共识,而是在特定历史、政治与技术条件下逐步被建构出来的治理现实。

首先,多样性并不是自然存在以及等待被发现和拯救的对象,而是一种在名录、清单、濒危等级与统计指标中被持续生成的“濒危现实”。通过“交易性现实”^①(transactional realities)的概念,哈里森等人强调,对多样性的界定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价值取向的分类实践。在将其转译为“可枚举、可比较、可管理”的对象的同时,也将其置入一个以损失、枯竭与不可逆衰退为核心的时间框架之中,从而使保护成为一种具有道德紧迫感且难以被质疑的行动。由此,“濒危”并非对客观状态的中性描述,而是一种将未来风险前置到当下的治理技术。

其次,多样性之所以能够进入治理体系,其依

赖于实践中的“部分化”处理。文章通过作物种子、动物DNA、植物标本与语言录音等案例分析指出,多样性并非以整体形态被保存,而是被拆解为可采集、可复制、可储存的代表性单元。在这种情况下,异地保存并不只是空间上的转移,而是一套从田野阶段就已开展的识别、筛选与再编码机制。通过冷冻、封存与延迟使用,多样性被维持在一种“尚未兑现”的潜在状态,其价值被系统性地投向未来而非当下。在这一过程中,多样性逐渐从“正在消失的对象”转变为一种可被调度和期待的未来资源。

再次,基于视觉民族志的图文分析,多样性被保存与“稳定下来”的物质与制度条件得到了揭示。储存库不是抽象的象征,而是由冷柜、液氮罐、容器、编号系统与操作流程构成的实践环境。正是在这些高度日常化、官僚化的技术系统中,对未来的期待被嵌入当下的工作常规,多样性由此被维持为一种可被长期持有、延迟调用的资源。储存库因此显现为一种持续运行的未来管理装置,而非单纯的“拯救空间”。此外,多样性保护的结构性张力在围绕“替代物”(proxies)的讨论中得到了揭示。^②在异地保存的实践中,真正被保存和投资的并非“多样性”本身,而是种子副本、DNA样本或数字化记录。在制度运作中,这些替代物逐渐取代其所表征的整体,并占据了“多样性本身”的位置。被保存的始终只是部分,但被赋予了代表整体未来的能力。在此,多样性保护并非被动延缓损失,而是一种主动建构未来的实践:灭绝技术、粮食安全、生态修复等想象都以当下对多样性的分类、冻结与储存为前提。

哈里森等人没有将多样性视为静态保护的

①Rodney Harrison, Esther Breithoff and Sefryn Penrose, “Conserving Diversity”,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56-59.

②Esther Breithoff, “Proxies”,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121-131.

象,而是将其呈现为一种在分类、技术、制度与未来想象中不断被制造的治理现实。这一处理方式不仅深化了遗产研究对多样性的理解,而且也清晰地回应了全书的核心关切,即遗产实践并非面向过去,而是在当下通过高度具体的技术化操作,持续参与未来的生成。

(二)过剩:在物质泛滥中如何决定“留下什么”

“过剩”将遗产研究的重心从“濒危”“消失”与“抢救”的叙事转向对当代社会日益常态化的物质积累的讨论。在大规模生产、快速消费与持续废弃并存的现实下,可被保存之物越来越多,那么究竟如何决定“留下什么”?通过讨论博物馆收藏实践与家庭日常保留的行为,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等人指出,“过剩”并非单纯的数量问题,而是一种涉及价值判断、情感负担、制度责任与未来伦理的结构性困境。^①

博物馆本身具有内在的“积累性”,其发展与19—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扩张、商品化与消费主义密切相关。一方面,博物馆为持续收藏提供了制度合法性;另一方面,它们又被寄予通过“慎重而有意义的选择”来抵抗消费主义短暂性的伦理期待。然而,随着社会历史在社会史收藏领域的不断扩展,博物馆收藏的膨胀几乎不可避免,这使得“应当收藏什么”成为一个持续失控的问题。这种局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缓解:首先是将保存重新理解为一种“筛选未来”的实践机制。博物馆通过分类、表征等原则,在无限的物质中建构“可理解的过去”^②;家庭则在情感依附、实用性与代际

责任之间反复权衡“该留下什么”。^③尽管二者在制度上存在差异,但作为应对过剩问题的策略,它们都通过选择性保留而将延续至未来的可能性赋予部分物质对象。其次是涉及“未公开展示的藏品”的政治化讨论。麦夏兰等人指出,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未公开展示的藏品往往被视为“低效”甚至“浪费”,而在归还、去殖民的语境中,这些藏品又被赋予截然不同的道德与政治意义。由此,是否保留、如何保留以及是否展示成为嵌入制度逻辑、伦理冲突与未来想象的政治问题。

关于博物馆收藏管理制度与家庭整理实践的民族志分析揭示出,“留下什么”从来不是单一标准的结果,其中最具解释力的是“末日橱柜”(cupboards of doom)概念。无论在博物馆还是家庭中,它都指向一种被延宕的决策状态——物件既未被正式保留,也未真正被丢弃,而是悬置于充满焦虑的不确定中。这种“暂不决定”的状态恰恰揭示了过剩条件下保存实践的情感负担与伦理困境。所谓“过剩”并不意味着遗产实践的失效,而是一种内在于遗产体系之中的结构性现实,需要被持续地识别、应对与调节。遗产不等同于对一切事物的无条件保存,而是在取舍过程中不断协商哪些事物应当被带入未来。换句话说,保留、转移与丢弃等操作层面的工作被赋予了明确的理论意义,并成为理解遗产如何在当下参与未来建构的关键机制。

(三)不确定性:深远未来如何被理解与治理

“不确定性”将遗产研究从“应当保护什么”的

① Sharon Macdonald, Jennie Morgan, and Harald Fredheim, “Too Many Things to Keep for The Future?”,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155–168.

② Harald Fredheim, Sharon Macdonald, and Jennie Morgan, “Curating Museum Profusion”,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169–189.

③ Jennie Morgan and Sharon Macdonald, “Curating domestic profusion”,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202–222.

讨论推进到“如何在不可预测的未来条件下行动”的层面。不确定性不再被视为风险管理语境中的负面状态,而是被系统性地重构为一种内在于遗产实践本身的时间结构。通过并置遗产保护、核废料管理、太空信息传递与长期信息存储等领域,科尼利厄斯·霍尔托夫(Cornelius Holtorf)等人指出,当实践被迫面向超出人类、制度与文明尺度的“深远未来”时,不确定性并非要被消除的对象,而是一种必须被承认、吸纳并制度化的现实条件。

本主题的关键贡献不在于重复未来“难以预测”的常识,而在于揭示不确定性如何被转化为形塑当下实践逻辑的重要装置和治理工具。此外,霍尔托夫等人还提出,不确定性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遗产治理中的问题或失误,相反,它构成了遗产实践持续生成意义与责任的重要条件。^①正是通过承认并与不确定性共处,遗产治理才得以避免将当下的价值判断直接固化为对未来的预设。

上述观点在英国湖区世界遗产的民族志研究中得到了具体呈现。在该案例中,世界遗产并非一个用以“稳定”未来的技术手段,而是一个不断生产张力的实践场域:制度化的保护目标与地方日常生活之间、长远的保护愿景与生计方式的变化之间始终处于持续协商之中。在这里,不确定性并非抽象意义上的“风险”,而是深深嵌入人与土地、劳动过程以及代际关系的日常实践之内。也正因如此,遗产的未来始终处在被延宕、调整与重写的过程中。当分析推进至核废料、太空信息与极端时间尺度的案例时,不确定性被推向其逻辑极限。面对一个不可预期,甚至可能不存在的未来社会,实践的目标不再是“确保成功”,而是通过冗余、多重的时间策略与开放沟通,使未来始终保留被重新理解与再介入的可能。

(四)转变:在变化中实践遗产

“转变”关注的是遗产实践中一个长期存在却往往被回避的问题:哪些遗产被允许发生变化,哪些遗产则必须维持不变?通过对建成遗产、文化景观与再野化项目的比较分析,凯特琳·德西尔维(Caitlin DeSilvey)等人指出,变化并非遗产保护的对立面,而是一个可以被选择性管理、制度化调节的过程。换句话说,遗产并不是通过“阻止变化”来面向未来,而是通过对变化节奏、方向与形式的筛选来持续塑造可接受、可想象、可被关怀的未来。

转变并非例外情形中的偶发事件,而是遗产实践中始终存在的常态。此外,转变并非一种中性的、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在制度安排、专业话语、资金机制与价值判断的共同作用下被不断塑形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某些转变被赋予“自然演进”“可持续更新”或“再生”等正面命名,而另一些则被界定为“破坏”“失序”或“损失”。这些看似技术性的区分背后实际上交织着经济利益、审美规范、生态伦理与地方认同之间的复杂博弈。

关于建成遗产与历史环境管理的研究揭示出,通过评估体系、修复规范与使用许可等制度工具可以对“可接受的变化”进行界定和规范。这些机制并非否认变化的发生,而是通过程序化与技术化的方式将变化引导至可被管理的未来路径之中。换句话说,变化是被允许的,但必须以特定方式发生;更新也是可能的,但需维持某种被认可的连续性。由此,遗产实践呈现为一种通过限定变化的形式与边界来塑造未来形态的制度性过程。

通过对葡萄牙科阿河谷、英国康沃尔瓷土景观与奥福德内斯的比较研究,德西尔维等人指出,即便在“让自然回归”的再野化实践语境中,遗产的转变依然高度依赖物种选择、目标状态设定、边

^①Sarah May, Cornelius Holtorf, “Uncertainty Futures”,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263-275.



界划分与资源配置。相应地,再野化并非放任不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实施人为干预。通过“固定”^①(fix)与“逃逸线”^②(lines of flight)等概念,德西尔维等人展示了遗产管理如何在一方面承认自然—文化的纠缠,另一方面又不断试图收束其不确定性。这使转变清晰地显现了世界建构的过程:未来通过不断决定“何种生态值得被引入”“何种变化可以被称为恢复”而被书写。除了涉及不同遗产类型外,相关讨论还推及至遗产的伦理与政治层面。视觉随笔与对话形式的写作方式刻意保留了研究者之间的分歧、犹疑与协商过程,使知识生成本身成为分析对象。“扰生性遗产”(ruderal heritage)的概念主张将遗产理解为在扰动、废墟化与持续生成中展开的过程,而非需要被稳定化的对象。这一视角明确挑战了以完整、控制与长期维持为核心的传统保护逻辑,强调与非人类力量、不可控过程的协作潜力。^③

将“转变”主题放回全书的整体结构中,可以看到它与其他三大主题之间富有张力的回应关系:与“多样性”部分通过异地保存减缓变化的逻辑不同,“转变”强调在变化中生成新的生态—文化关系;与“过剩”部分关注规模与感知不同,“转变”将变化视为一种普遍背景状态;与“不确定性”部分强调与未知共处相比,“转变”更直接揭示了变化如何被规范化、被政治化。四者共同指向本书的核心论点:遗产并非保存过去的工具,而是通

过管理变化、组织时间与分配关怀而持续参与未来世界的生成。

三、伦理路径反思:

迈向“未来生成”的遗产实践

作为具体的社会—物质实践,遗产实践应如何持续参与并塑造未来世界的生成。基于民族志与视觉研究形成的跨领域比较,哈里森等人将分析重心从“比较对象”推进到“比较条件”,由此揭示不同遗产实践如何在特定的地理、政治、社会与生态语境中被塑造,并由多尺度行动者共同决定其未来政治。

未来并非抽象结果,而是由具体实践生产出来。不同领域所生成的未来彼此并不相同,甚至可能相互冲突。参照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讨论,哈里森等人进一步指出,未来并非遥不可及的远景,而是在当下通过关于“保存什么、如何保存”的价值判断塑造出来的。同时,他们搭建起一组用于贯通四大主题的分析轴线,包括“多样性与缺失”“遗产与废弃物”“故事与过剩”“资源与动机”与“坚守与放手”。遗产保护实践并非中性的技术过程,而是在价值生产的同时,通过制度化的取舍与优先序设定,在当下持续塑造未来的可能性结构。^④

许多以“为了未来而保护”为名的实践在长期尺度上并不可持续。在人类世与气候变化加速的

①Nadia Bartolini, “Fixing Naturecultures: Spatial and Temporal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Heritage Transformation and Entanglement”,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375–395.

②Antony Lyons, “Sensitive Chaos—geopoetic flows and wildings in the edgelands”,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396–423.

③Caitlin DeSilvey, Nadia Bartolini, and Antony Lyons, “Processing Change”,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447–448.

④Rodney Harrison, et. al.,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in Rodney Harrison, Caitlin DeSilvey, Cornelius Holtorf, Sharon Macdonald, et. al. (eds.) *Heritage Futures: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Na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actices*. London: UCL Press, 2020, pp.484–485.

背景下,将当下价值简单投射至未来,反而可能构成新的风险。哈里森等人主张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参与变化与转型,将不确定性视为需要被治理与协商的条件,而非单纯需要被消除的威胁,从而为遗产实践重新打开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总 结

作为一部以未来为轴心、以比较为方法、以实践为对象的集体研究成果,《遗产未来:自然与文化遗产实践的比较路径》不仅为批判遗产研究提供了一套新概念,而且还改变了遗产研究默认的问题结构,即遗产关乎的是“当下的保存实践如何生产未来世界”。通过将“未来”从分析背景转化为分析对象,将“保存”从价值宣言转化为可追踪

的实践过程,并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的分割还原为需要被解释的历史产物与治理效果,本书使“未来生成能力”成为一个可比较、可讨论,亦可被批判的分析维度。

哈里森等人试图将遗产研究引向一个更为复杂且难以回避的方向:不再以“拯救”或“挽留”为默认的正当性基础,而是以对未来的明确思考来检验当下保存实践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不再仅仅追问“应当保存什么”,而是持续反思“通过保存与不保存的实践,我们正在塑造怎样的未来”。因此,本书并不只是讨论“遗产是什么”,而是进一步追问:在一个不确定性、损失与转变已成为常态的时代,人们应当如何通过遗产实践来重新思考并组织关怀、责任与行动。

青花“一路清廉”婴戏图梅瓶

●王莹莹

质地:瓷器

年代:明崇祯

尺寸:高31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10.5厘米,腹围50厘米。

级别:一级

来源:现收藏于桂林博物馆

此二瓶为一对两件,造型实用简朴,瓷质细润,釉色艳丽典雅。小盘口略外撇,颈略长,肩略溜斜,直长腹,腹以下至足渐收,矮圈足。整器图案共四层,各层间以弦纹分隔。颈部绘青花蕉叶纹;肩部绘青花如意云肩纹,云肩内绘折枝莲花;胫部一件绘青花折枝桃花,另一件绘青花缠枝莲花。腹部主题图案绘青花群童戏耍场面,因图中多与荷莲有关,故取意“一路清廉”“连生贵子”等。小童中有人扮装帝王将相,有人扮作随从侍卫。有持刀弄棒者,有弯弓射箭者,有执荷叶当帝王华盖者,有执莲花为仪仗者。有一小童所捧之瓶内置三戟,取意“平升三级”。画面中怪石或隐或现,蕉叶迎风摇摆,晴空丽日,其乐无穷。整图线条流畅,人物造型生动,构图精巧,场面宏大而不显冗繁。青花色调深浅浓淡有别,层次丰富,实为一幅精美的人物故事画。

(供图:桂林博物馆)